

爸爸去哪儿？父亲育儿投入及其对中国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许 琪 王金水

提 要：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在 2014—2015 学年的追访调查数据研究了父亲育儿投入的水平、影响因素及其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当代中国家庭，父亲参与育儿比较普遍，但参与水平依然明显低于母亲。第二，父亲育儿投入的水平除了受子女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户口性质和居住地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祖辈是否参与育儿和家庭居住格局的影响。第三，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与母亲相比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参与事务性的育儿活动相比，父亲与子女的情感沟通对青少年发展更加重要；父亲育儿投入对儿子和女儿都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父亲育儿投入 青少年发展 中国 性别差异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

由父亲和母亲共同组成的完整家庭对儿童早期社会化和青少年发展的积极影响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学术界对父亲和母亲的关注度和关注点却有明显不同（Walsh, 2016; East et al., 2018）。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影响，学术界往往更加关心父亲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和母亲的育儿投入，而对父亲育儿投入和母亲经济功能的研究则相对不足（Lamb, 2000）。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女性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这种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已逐渐被打破。一方面，女性在婚后劳动参与率的大幅提高使妻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些研究也陆续发现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学业表

^{*} 本研究得到南京大学文科“双重”项目“中国社会变迁与应用社会学的探索”的资助。

现、认知能力发展和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Beller, 2009）。另一方面，传统家庭角色的转变也迫使父亲需要更多地承担起养儿育女的责任，这导致近些年来，关于父亲育儿角色和育儿功能的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Pattnaik, 2013）。

与很多西方国家相同，中国家庭的育儿方式和育儿观念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转变。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那种完全由母亲承担育儿责任的育儿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指责。与此同时，社会上要求父亲分担育儿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湖南卫视热播的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更是将全社会关于父亲育儿的讨论推向了高潮（蒋一茗, 2014）。但这些讨论大多是泛泛而谈，科学严谨的关于父亲育儿投入的实证研究却并不多见。

鉴于此，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在 2014—2015 学年的调查数据，描绘当前中国父亲参与育儿的现状，并探索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包括：在中国，父亲参与育儿的程度有多高？与母亲相比，差距有多大？在什么情况下，父亲更可能参与育儿？父亲的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各方面的发展有何影响？这种影响与母亲相比有何异同？通过这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对当前关于父亲育儿的种种争论给予科学严谨的回答，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二、文献综述

（一）父亲育儿投入及其影响因素

西方学者关于父亲育儿角色的研究由来已久。在早期的研究中，理想中的父亲形象通常被定义为家庭经济支持的提供者、子女不良行为的惩戒者和性别角色规范的引导者。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才逐渐从上述传统的父亲角色向照料者（care-giver）或抚育者（nurturer）转变（Lamb, 2000）。在一篇经典研究中，兰姆等人（Lamb et al., 1985）正式提出了父亲育儿投入（father involvement）的概念，并将其操作化为三个维度，即：互动性、可接近性和责任性。“互动性”指的是父亲与子女直接面对面的互动，如喂孩子吃饭、一起做游戏、辅助完成家庭作业等。“可接近性”指的是父亲与子女发生间接的互动，即父亲在从事非育儿活动，但子女就在身边，父亲可以随时停止手上的活动去陪伴子女，如父亲在厨房做饭，子女在身边玩耍。“责任性”指的是父亲投入在各种能够体现出他对孩

子责任的活动上的时间，如为孩子挑选衣服和玩具、参加育儿培训等。

基于上述定义，兰姆等学者系统研究了美国家庭中父亲参与育儿的程度。他们发现，在父母双全但母亲不参加工作的美国家庭，父亲与子女发生直接互动的时间约是母亲的 20% ~ 25%；间接互动的时间约占母亲的 1/3；而在责任性方面，父亲花费的时间几乎为零（Lamb et al.，1987）。不过，如果母亲有工作，父亲的育儿投入将有明显增加。例如，当母亲有工作时，父亲在互动性和可接近性两个方面投入的时间将分别占母亲的 33% 和 65%，这大大高于母亲不工作时的情况，但是在责任性方面，无论母亲是否有工作，父亲投入的时间都很少（Lamb et al.，1987）。

兰姆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美国，母亲依然是育儿的主力，即使在母亲有工作的情况下，父亲育儿投入的时间也大大低于母亲。不过，后续的研究发现，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父亲投入到育儿中的时间确实有所增加：直接互动的时间已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不到母亲 1/3 的水平增加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43%；在可接近性时间方面，也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不到母亲一半的水平增加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2/3（Pleck，1997）。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增长却非常缓慢，而且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距离性别平等依然很遥远（Craig & Mullan，2011）。

虽然平均来看，父亲投入到育儿中的时间依然明显低于母亲，但不同家庭的情况却并不相同。那么父亲的育儿投入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首先，子女的年龄和性别很重要，当子女年龄较小且为男孩的时候，父亲投入的时间会明显增加（Pleck，1997）。其次，母亲的工作状况和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也很关键，当母亲有工作（特别是全职工作）且比父亲的收入高时，父亲投入到育儿活动中的时间会明显增加（Raley et al.，2012）。再次，父亲的育儿投入还深受其内化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当父亲的性别角色观念较为现代的时候，他们参与育儿的意愿将明显增加（Milkie et al.，2004）。最后，父亲的育儿投入还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开明和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提高父亲参与育儿的意愿和水平（Doherty et al.，1998）。

（二）父亲育儿投入对子女的影响

父亲对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之前，学术界更加关心的问题是父亲缺失（father absence）。父亲缺失指的是在儿童成长中只有母亲而没有父亲的一种特殊情况。这一现象原本只出现在母亲丧偶、父亲服刑等极端情况下，但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离婚率和未婚生育率的不断提高，父亲缺失及其对儿童发展的不良后果已变得越来越突出，其自然而然就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McLanahan et al. , 2013）。不过，正如兰姆（Lamb, 2000）所言，研究父亲是否出现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虽然重要，但这种二分法并不能说明父亲缺失的危害是如何产生的。例如，父亲的缺失既会导致家庭经济状况的恶化，也会减少儿童与父亲互动的的时间，而区分这两种机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重要的。除此之外，即使在父母双全的家庭环境中，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兰姆认为，有必要将父亲的育儿投入作为一个单独的影响因素纳入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当中（Lamb, 2000）。

沿着这一思路，西方大多数研究都发现，父亲育儿投入对儿童的学业发展、认知水平、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和日常行为等方面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Barnett et al. , 1992；Amato, 1994；Hwang & Lamb, 1997；Flouri & Buchanan, 2002）。不过，目前的研究依然存在两点争议。一是父亲育儿投入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与母亲是否相同。一些研究认为二者没有显著差异（Cabrera et al. , 2000；Lamb, 1997）；但也有研究认为，父亲扮演着与母亲不同的角色（Lewis, 1986），因而其影响也与母亲不完全相同（Flouri & Buchanan, 2003）。二是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对儿子和女儿是否有所不同。一些研究发现，父亲育儿投入只对儿子有显著影响（Barnett et al. , 1992）；但也有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对儿子和女儿都存在（Amato, 1994）。

（三）对中国的研究

以上关于父亲育儿投入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国家的情况，仅有少数学者使用中国数据对父亲育儿投入进行实证研究。例如，徐安琪和张亮曾使用 2006 年的一项专门针对上海家庭的调查数据做过一系列关于中国父亲育儿投入水平、影响因素及其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研究（徐安琪、张亮，2008，2009；张亮、徐安琪，2009）。但这些研究仅针对上海，且调查年份较早，难以反映当前中国的总体状况。此外，这些研究虽然在中国的情境下对一些西方理论（如家庭生态论、亲职技能说、守门人理论等）进行检验，并得到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但是，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变量（如祖辈参与育儿、因人口流动导致的子女与父母分居两地等）并没有纳入分析框架。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大多直接借鉴西方理论，尚未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设计，因而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笔者认为，中国家庭与西方相比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自身的特点。首先，中国是一个深受父权制家庭观念影响的国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这使得父亲参与育儿所面临的文化阻力将比西方国家更大。其次，中国是一个有着大家庭传统的国家，特别是祖父母帮助照顾孙子女的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因而家中需要承担育儿责任的往往首先是母亲，其次是祖父母，最后才是父亲。那么，祖父母是否参与育儿可能对父亲的育儿投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最后，在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也对儿童的抚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很多农村家庭，父亲外出打工导致儿童在很长时期内只与母亲生活在一起，虽然这与因离婚导致的父亲缺失不完全相同，但它在客观上造成了儿童与父亲分居两地的局面，而这无疑会对父亲的育儿投入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将结合中国的社会背景初步探索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试图描述在当代中国家庭中，父亲参与育儿的绝对水平以及与母亲相比的相对水平。其次，本文试图探索影响父亲育儿投入的因素，尤其是增加了对祖辈参与育儿和家庭居住结构这两个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变量的关注。最后，本文试图探索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各方面发展的影响。我们将从学业表现、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和行为表现四个方面全面评估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探讨父亲的影响与母亲的影响之间的差异，以及父亲育儿投入是否对儿子和女儿存在不同影响。虽然我们的研究是探索性的，但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父亲参与育儿的状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三、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tudy, CEPS）在 2014—2015 学年的追访调查数据。CEPS 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设计实施的、具有全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该调查以 2013—2014 学年为基线，以初中一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了 28 个区县内的 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的近 2 万名学生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学生的基本信息、身心健康、成长经历、社会交往、认知发展、学习成绩、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等很多方面。

在 2014—2015 学年, CEPS 对基线调查中的 10279 名初一学生进行了追踪调查, 并成功追访到了其中的 9449 名学生, 追访成功率为 91.9%。此次追踪调查详细询问了父亲和母亲参与育儿的状况, 所以, 除了少数变量取自基线调查以外, 本文将主要使用该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由于本文所用的变量存在一些缺失值, 最终分析使用的样本量为 8312 人。

(二) 变量

本文使用的变量包括三组。第一组是与父母的育儿投入相关的三方面变量。

一是父母在照顾日常生活起居、辅导功课学习和陪伴娱乐玩耍三个方面的参与情况。如果父亲或母亲参与了这三项育儿活动, 则计 3 分; 参与了两项活动则计 2 分; 参与了一项活动则计 1 分; 没有参与任何活动则计 0 分。这样, 就可以分别得到两个取值为 0~3 分的变量, 分别测量父亲和母亲育儿活动的参与情况^①。

二是父亲和母亲平时与子女沟通交流的情况。问卷中询问了子女平时与父母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与同学的关系”“与老师的关系”以及“心事和烦恼”的频率, 原始选项有三个, 即: “从不”“偶尔”和“经常”。分析时, 我们对这三个选项分别赋值为 1 分、2 分和 3 分, 并分别将父亲和母亲在四个问题上的得分加总, 从而得到两个综合测量指标, 分别测量父亲和母亲平时与子女沟通和交流的频率^②。

三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卷直接询问了受访学生与父母关系的亲近程度, 原始选项有三个, 分别为: “不亲近”“一般”和“很亲近”。我们对这三个选项分别赋值为 1 分、2 分和 3 分, 得到了两个测量父母与子女关系亲密程度的指标。

第二组变量是青少年发展变量, 分别从学业表现、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和表现为表现四个方面测量青少年发展。

与学业表现相关的变量有三个。一是受访学生在语文、数学和英语三门主课上的考试成绩, 这三门成绩均直接从学校教务部门获得, 我们将这三门成绩加总, 得到学生学习成绩的一个综合指标。二是学生的学习态度, 问卷中让家长评价子女的学习态度, 原始选项有五个, 分别为: “很不认真”“不太认真”“一般”“比较认

① CEPS 只测量了受访者父母在这三个方面的育儿活动。此外, 从数据我们无法得知父母在这三方面育儿投入的准确时间。

② 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 四个指标只有一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 且该公因子在 4 个观测指标上的因子负载非常接近, 因而直接相加进行测量是合理的。

真”和“很认真”，分析时我们将之作为一个取值为1~5分的定序变量使用。三是受访少儿对自己的教育期望，问卷中可供选择的选项有10个，分别为：“现在就不要念了”“初中毕业”“中专/技校”“职业高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和“无所谓”，分析时我们将选择“无所谓”的编为缺失值，其余则根据学制转换为一个用受教育年限表示的连续变量。

与身心健康相关的变量也有三个。一是身体健康，问卷中询问了受访学生过去一年是否经常生病，选项分别为：“没有”“很少”“经常”，分别赋值为1分、2分和3分。二是心理健康，问卷中使用了一个包含10道题目的量表来测量受访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我们将这10道题的得分加总，从而得到了一个反映每一个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综合指标。三是自评健康，问卷中有一道题让受访学生总体评价自身的健康状况，选项有5个，分别为：“很不好”“不太好”“一般”“比较好”“很好”，分析时我们将之作为一个取值为1~5分的定序变量使用。

与社会交往相关的变量有两个。一是朋友数量，该变量可直接从问卷中得到。二是交友质量，问卷让受访者从10个方面来评价其朋友的质量，其中三个为正向指标（如学习努力刻苦），另外七个为负向指标（如逃课、旷课、逃学）。如果受访者在所有正向指标上的朋友数量都为0，或者在负向指标中的任一个上朋友的数量不为0，我们就认为其交到了坏朋友（赋值为0），否则就都是好朋友（赋值为1）。

与行为表现相关的变量有两个。一是正向行为，问卷询问了受访者平时“帮助老人做事情”“遵守秩序、自觉排队”“待人真诚友善”的频率，我们将受访者在这三道题上的得分加总，从而得到一个反映其正向行为的综合测量指标。二是负向行为，问卷询问了受访学生平时“骂人、说脏话”“吵架”“打架”“欺负弱小同学”“脾气暴躁”“注意力不集中”“逃课、旷课、逃学”“抄袭作业、考试作弊”“抽烟、喝酒”“上网吧、游戏厅”这10种不良行为的频率。我们将受访者在这10道题上的得分加总，从而得到一个测量其负向行为表现的综合指标。

本文的第三组变量是受访者的基本特征。这组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户口所在地、户口性质、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是否与父亲同住、是否与母亲同住、是否与祖父母同住^①、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父亲和母亲的职业分

① 本文使用是否与祖父母同住来测量祖父母参与育儿的情况。这种测量方法的缺陷是会忽视非同住祖父母的育儿投入，但因为数据中没有关于祖父母育儿投入相关的问题，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类和家庭的经济状况^①。在分析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时，这些变量将作为自变量使用；在分析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时，这些变量将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表 1 对这组变量进行了统计描述。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变量	统计值	变量	统计值
性别（%）		与母亲同住（%）	
女	49.1	是	89.9
男	50.9	否	10.1
年龄（岁）	14.5（0.7）	父亲教育年限（年）	10.6（3.2）
户口所在地（%）		母亲教育年限（年）	10.0（3.5）
本地	81.5	父亲职业（%）	
外地	18.5	高端非农职业	18.9
户口性质（%）		一般非农职业	58.3
农村	52.9	农民	16.3
非农	47.1	无业或其他	6.5
居住地（%）		母亲职业（%）	
农村	37.2	高端非农职业	15.2
城镇	62.8	一般非农职业	50.6
独生子女（%）		农民	18.5
是	45.4	无业或其他	15.7
否	54.6	家庭经济状况（%）	
与祖父母同住（%）		非常困难	3.6
是	29.3	比较困难	16.8
否	70.7	一般	72.9
与父亲同住（%）		比较富裕	6.4
是	87.0	很富裕	0.3
否	13.0	样本量（人）	8312

注：（1）高端非农职业包括：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师、医生、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2）一般非农职业包括：一般职工、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3）对于连续变量，括号中给出了标准差。

^① 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这三个变量取自 2013—2014 学年的基线调查，其余变量取自 2014—2015 学年的追踪调查。若追踪调查中有缺失值，且该变量在基线调查中也有，则用基线调查中的值替代。

四、分析结果

(一) 父亲育儿投入及其影响因素

表2 从三个方面描述了父亲和母亲育儿投入的总体情况。首先，从育儿活动的参与情况来看，样本中有 49.6% 的父亲平时会照顾子女的日常生活起居，29.8% 的父亲会辅导子女做功课和学习，33.3% 的父亲会陪同子女娱乐玩耍。相比之下，母亲平时参与这三项育儿活动的百分比则分别为 78.9%、40.6% 和 42.9%。所以，母亲的育儿投入都明显高于父亲。其次，从父母与子女沟通交流的情况来看，子女表示平时经常与父亲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与同学的关系、与老师的关系以及自身的心事和烦恼的百分比都明显低于母亲，而表示从来不与父亲讨论上述问题的百分比则都明显高于母亲，所以母亲平时与子女的沟通与交流也比父亲更多。最后，从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来看，受访者认为与父亲不亲近、一般和很亲近的百分比分别为 4.0%、40.6% 和 55.4%。相比之下，表示与母亲的关系不亲近、一般和很亲近的百分比则分别为 2.0%、24.7% 和 73.3%。所以子女与母亲的关系也更加亲密。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我们认为，在中国虽然父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育儿活动之中，但他们育儿投入的水平依然明显低于母亲。这一结果既可能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有关，也可能与祖辈参与照顾孙辈的家庭传统和因人口流动导致的两地分居的居住模式有密切的关联。在表3 中，我们将使用回归模型对影响父亲育儿投入水平的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表 2 父亲与母亲育儿投入对比

父亲		母亲	
日常生活起居（%）		日常生活起居（%）	
是	49.6	是	78.9
否	50.4	否	21.1
辅导功课学习（%）		辅导功课学习（%）	
是	29.8	是	40.6
否	70.2	否	59.4
陪同娱乐玩耍（%）		陪同娱乐玩耍（%）	
是	33.3	是	42.9
否	66.7	否	57.1



续表

父亲		母亲	
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		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	
从不	17.8	从不	10.0
偶尔	60.1	偶尔	44.8
经常	22.1	经常	45.2
讨论与同学的关系（%）		讨论与同学的关系（%）	
从不	27.5	从不	16.2
偶尔	53.5	偶尔	46.9
经常	19.0	经常	36.9
讨论与老师的关系（%）		讨论与老师的关系（%）	
从不	27.1	从不	18.0
偶尔	50.5	偶尔	46.0
经常	22.4	经常	36.0
讨论心事或烦恼（%）		讨论心事或烦恼（%）	
从不	36.7	从不	24.2
偶尔	43.3	偶尔	38.9
经常	20.0	经常	36.9
与子女关系（%）		与子女关系（%）	
不亲近	4.0	不亲近	2.0
一般	40.6	一般	24.7
很亲近	55.4	很亲近	73.3

表 3 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育儿活动	沟通交流	与子女关系
男性	0.095 * (0.042)	0.100 * (0.048)	0.090 * (0.045)
年龄	-0.035 (0.032)	-0.091 * (0.036)	0.030 (0.033)
外地户口	0.190 *** (0.057)	-0.185 ** (0.066)	-0.175 ** (0.060)
非农户口	-0.080 (0.054)	-0.127 * (0.061)	-0.135 * (0.056)
居住在城镇	0.199 *** (0.057)	-0.092 (0.065)	-0.143 * (0.059)
父亲教育年限	0.104 *** (0.010)	0.059 *** (0.011)	0.047 *** (0.011)
母亲教育年限	0.010 (0.009)	0.032 ** (0.010)	0.002 (0.010)



续表

	育儿活动	沟通交流	与子女关系
父亲职业（高端非农职业 = 0）			
一般非农职业	-0.182 ** (0.068)	-0.137 (0.079)	-0.156 * (0.073)
农民	0.036 (0.112)	-0.096 (0.128)	-0.025 (0.119)
无业和其他	-0.286 ** (0.102)	-0.395 *** (0.117)	-0.415 *** (0.109)
母亲职业（高端非农职业 = 0）			
一般非农职业	0.104 (0.073)	0.001 (0.086)	0.008 (0.080)
农民	0.017 (0.114)	0.188 (0.130)	0.199 (0.121)
无业和其他	-0.243 ** (0.085)	-0.262 ** (0.098)	-0.037 (0.091)
家庭经济状况	-0.102 ** (0.038)	0.164 *** (0.043)	0.133 *** (0.040)
独生子女	0.332 *** (0.049)	0.155 ** (0.056)	0.138 ** (0.052)
与祖父母同住	-0.306 *** (0.049)	0.078 (0.056)	0.003 (0.052)
与父亲同住	2.482 *** (0.102)	0.644 *** (0.083)	0.742 *** (0.077)
与母亲同住	-0.027 (0.094)	-0.218 * (0.095)	-0.163 (0.088)
截距		7.429 *** (0.592)	
截距 1	2.254 *** (0.531)		-1.560 ** (0.546)
截距 2	3.420 *** (0.531)		1.450 ** (0.545)
截距 3	4.584 *** (0.532)		
样本量	8312	8312	8312

注：（1）对“交流与沟通”使用的是线性回归模型，对另两个方面使用的都是定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虽然严格来说“交流与沟通”是一个定序变量，但线性回归是更合适的分析方法，原因在于：第一，该变量有 9 个取值，类别较多，使用 ologit 模型会产生 8 个截距，模型不简约；第二，实践证明，线性回归和 ologit 的分析结果在因变量序列类别较多时很接近；第三，相比 ologit 模型，线性回归模型系数更易于解释，不同模型间的系数可直接比较；（2）职业分类中，“无业和其他”选项中的“其他”是 CEPS 数据样本未对父母职业进行选择的情况，因为这类人的数量不多，编码时我们将之与无业者合并，虽然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这类人与高端非农职业相比有显著差异，但因为这一组人的构成比较复杂，我们没有对其实际意义进行解释；（3）模型中我们通过“是否与父亲同住”和“是否与母亲同住”来测量子女与父母的居住安排，如果将这两个变量交互分类，可以得到四类，即：无父无母、仅有父亲、仅有母亲和父母双全，但分析结果显示纳入两个变量与交互分类后的拟合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我采用了比较简约的一种模型设定方法；（4）* p < 0.05，** p < 0.01，*** p < 0.001。

从表3可以发现，首先，子女的性别和年龄对父亲的育儿投入有显著影响。当子女是男孩时，父亲在所有三个方面的育儿投入水平都会显著增加。此外，当子女年龄较小时，父亲与子女沟通交流的频率也会显著增加，这与国外的研究发现一致。

其次，子女的户口和居住地也对父亲育儿投入有显著影响。当子女是外地户口（即流动儿童）时，父亲参与育儿活动的种类会增加，但与子女的沟通交流和与子女的关系都会受到负面影响。子女是非农户口对父亲参与育儿活动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降低其与子女情感交流的频率和与子女关系的亲密程度。如果子女居住在城镇，父亲参与育儿活动的种类会增加，但与子女关系的亲密程度会下降。综合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处于流动之中和居住在城市的子女得到父亲日常照料的可能性较高，但与父亲的沟通和感情却较弱。这可能是因为流动和城市生活经历增加了父亲在日常事务上的育儿投入，但因为工作繁忙等其他原因，他们也或多或少忽视了与子女的情感交流，导致了与子女关系的疏离。不过，流动经历和居住在城市对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再次，父母的教育、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也对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当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较高时，他们在所有三个方面的育儿投入水平都会显著增加^①。这可能是因为，较高的教育和职业地位改变了父亲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这使得他们更加愿意参与到育儿活动之中。分析结果还显示，母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母亲通常也有较高的家庭地位和“议价能力”，因而，她们也更有能力说服父亲参与育儿工作。此外，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父亲参与事务性育儿活动的可能性越小，但与子女沟通交流的频率以及与子女的关系都会显著提高。这可能是因为，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会将事务性的育儿活动外包，而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与子女的情感交流之中。

最后，家庭的人口结构和居住格局也会影响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具体来说，在独生子女家庭，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相对较高。基于资源稀释理论（Blake, 1981），这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家庭，父亲可以将有限的育儿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一个小孩身上。此外，当家中有同住老人的时候，父亲参与育儿活动的数量会显著

^① 模型输出显示，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且在表3的模型输出结果中，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和职业大多显示出独立的显著影响。

降低，但与子女沟通交流以及与子女的亲密关系并不会受老人同住的影响。由此可见，祖辈的存在确实对父亲的育儿功能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这种替代作用仅针对事务性的育儿活动。最后，父母是否在家中居住也对父亲育儿投入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当父亲不在家中居住的时候，其参与育儿活动、与子女沟通交流以及与子女的关系都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在当代中国家庭，外出务工经商是造成父亲与子女两地分居的主要原因。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父亲外出务工经商可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但因此造成的两地分居，以及因为两地分居导致的育儿投入水平的下降应该引起所有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二) 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在上一部分，我们着重分析了父亲育儿投入的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研究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表4列出了以十个青少年发展指标为因变量并以三个育儿投入指标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①。除了三个育儿投入指标以外，模型分析还控制了受访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特征，不过受篇幅所限，表中只汇报了与三个育儿投入指标相对应的回归系数及其标准误。此外，我们又通过线性回归模型计算了纳入三个育儿投入指标以后每个模型的R²增加量及其统计检验结果^②。同时，为了比较父亲育儿投入与母亲育儿投入的影响之间的差异，我们对二者分别进行了研究，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发现，首先，我们在仅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三个与父亲育儿投入相关的指标以后，所有模型的R²都有显著提高。由此可见，父亲育儿投入确实对青少年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显著影响。其次，对比三个不同维度的父亲育儿投入可以发现，父亲育儿活动的影响仅在部分因变量上统计显著，相比之下，与子女交流沟通以及与子女的关系则几乎对所有因变量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由此可知，父亲与子女的情感交流比单纯提供日常照料更加重要。而从表3的分析结果看，情感交流恰恰是很多父亲（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亲和流动儿童的父亲）在育儿时相

① 在回归分析时，我们根据因变量的类型选择了不同的模型。例如，对于连续型因变量，我们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对于二分类因变量，则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于定序因变量，则使用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但是在计算 ΔR^2 时，我们再以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分析方式分别计算了每个模型在纳入三个父亲育儿投入变量前后的R²值。

② 表中没有报告“身体健康”和“朋友质量”这两个变量对应线性回归模型的R²增量，因为这两个变量分别只有3个和2个取值，计算R²的风险较大。

对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最后，对比父亲和母亲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母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与父亲非常相似^①。如果我们将所有模型的 R^2 增量相加，父亲育儿投入的 R^2 增量之和为 24.44，而母亲育儿投入的 R^2 增量之和为 24.10，二者几乎完全相同^②。总体来看，父亲和母亲对青少年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

表 4 居住意愿的满足类型

	父亲				母亲			
	育儿活动	交流沟通	与子女关系	ΔR^2 (%)	育儿活动	交流沟通	与子女关系	ΔR^2 (%)
考试成绩	-1.776 ** (0.567)	2.904 *** (0.287)	2.019 (1.099)	1.41 ***	-0.817 (0.624)	3.366 *** (0.277)	2.666 * (1.274)	1.97 ***
学习态度	0.065 ** (0.021)	0.105 *** (0.010)	0.313 *** (0.040)	3.37 ***	0.020 (0.022)	0.109 *** (0.010)	0.327 *** (0.046)	3.07 ***
教育期望	-0.042 (0.034)	0.183 *** (0.017)	0.253 *** (0.067)	2.10 ***	-0.058	0.212 *** (0.038)	0.334 *** (0.017)	2.84 *** (0.078)
身体健康	0.045 (0.028)	0.005 (0.014)	0.217 *** (0.054)	—	0.040 (0.030)	-0.003 (0.014)	0.122 * (0.062)	—
心理健康	0.128 (0.088)	0.225 *** (0.044)	2.502 *** (0.170)	4.41 ***	0.024 (0.097)	0.175 *** (0.043)	2.796 *** (0.199)	3.61 ***
自评健康	0.044 * (0.020)	0.048 *** (0.010)	0.537 *** (0.040)	3.66 ***	0.063 ** (0.022)	0.043 *** (0.010)	0.559 *** (0.046)	3.07 ***
朋友数量	0.181 (0.180)	0.304 *** (0.091)	1.104 ** (0.348)	0.48 ***	-0.160 (0.199)	0.253 ** (0.088)	0.776 (0.406)	0.22 ***
朋友质量	0.003 (0.023)	0.118 *** (0.012)	0.189 *** (0.045)	—	0.041 (0.026)	0.101 *** (0.011)	0.273 *** (0.052)	—
正面行为	0.024 (0.024)	0.186 *** (0.012)	0.337 *** (0.046)	5.28 ***	0.001 (0.026)	0.204 *** (0.012)	0.396 *** (0.053)	6.14 ***
负面行为	-0.123 * (0.049)	-0.227 *** (0.025)	-0.952 *** (0.095)	3.73 ***	-0.197 *** (0.054)	-0.218 *** (0.024)	-0.923 *** (0.110)	3.18 ***

注：(1) 分析时控制了少儿的性别、年龄、户口所在地、户口性质、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教育年限、父母职业、家庭经济状况、是否与祖父母同住、是否与父母同住；(2) 各个模型的 ΔR^2 均基于线性回归模型得到，并且这里的 ΔR^2 都是基于原始 R^2 得到，计算方法是在仅有控制变量的模型中纳入解释变量，计算 R^2 的增加量；(3) 父亲育儿活动对学习成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点与理论预期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反向因果关系所致；育儿活动中有一项为“辅导功课学习”，所以可能是因为子女成绩较差导致父亲需要更多地去督促子女学习，但在横截面数据中我们尚无法厘清这种双向因果关系，这有待后续的研究去检验；(4)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① 由于父亲育儿投入和母亲育儿投入都采用了同样的测量方法，变量数目也一样，且都是基于同一个基准模型（即只有控制变量的模型）计算得到，所以是可以相互比较的。

② 将不同模型的 R^2 相加的做法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常见，这里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青少年发展是一个包含多个维度和多个测量指标的综合概念，因而只有进行某种综合才能比较父亲和母亲的相对影响力。

最后，为了进一步研究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我们将子女分男女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表 5 可以发现，父亲育儿投入对儿子和女儿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显著影响，但从交互项的统计检验结果看，在某些方面，这种影响确实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在与子女学业表现、行为表现和交友数量上，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要略强于女儿，而在其他方面，则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表 5 父亲育儿投入对儿子和女儿的不同影响

	儿子			女儿			交互项检验
	育儿活动	交流沟通	与子女关系	育儿活动	交流沟通	与子女关系	
考试成绩	-1.335 (0.845)	3.458 *** (0.423)	2.461 (1.660)	-2.209 ** (0.750)	2.318 *** (0.384)	2.005 (1.436)	*
学习态度	0.039 (0.028)	0.110 *** (0.014)	0.407 *** (0.056)	0.093 ** (0.030)	0.100 *** (0.015)	0.212 *** (0.057)	*
教育期望	-0.044 (0.051)	0.234 *** (0.026)	0.299 ** (0.101)	-0.034 (0.046)	0.128 *** (0.023)	0.237 ** (0.088)	***
身体健康	0.002 (0.038)	0.010 (0.019)	0.260 *** (0.076)	0.089 * (0.040)	-0.000 (0.021)	0.182 * (0.077)	—
心理健康	0.117 (0.127)	0.172 ** (0.063)	2.981 *** (0.249)	0.122 (0.121)	0.291 *** (0.062)	1.979 *** (0.231)	+
自评健康	0.047 + (0.028)	0.050 *** (0.014)	0.577 *** (0.056)	0.040 (0.029)	0.047 ** (0.015)	0.500 *** (0.057)	—
朋友数量	0.167 (0.315)	0.529 *** (0.157)	1.658 ** (0.618)	0.233 (0.162)	0.051 (0.083)	0.662 * (0.310)	**
朋友质量	0.022 (0.032)	0.120 *** (0.016)	0.236 *** (0.063)	-0.019 (0.035)	0.117 *** (0.018)	0.148 * (0.065)	—
正面行为	0.017 (0.036)	0.203 *** (0.018)	0.513 *** (0.070)	0.033 (0.031)	0.169 *** (0.016)	0.170 ** (0.059)	*** (0.059)
负面行为	-0.251 ** (0.077)	-0.245 *** (0.039)	-1.136 *** (0.151)	0.013 (0.059)	-0.212 *** (0.030)	-0.779 *** (0.113)	***

注：(1) 交互项检验指的是在同一个模型中纳入子女性别和父亲育儿投入的交互项，并检验该交互项的统计显著性；(2)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在 2014—2015 学年的追访调查数据研究了父亲育儿

投入的水平、影响因素及其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当代中国家庭,虽然父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育儿活动之中,但他们育儿投入的水平依然明显低于母亲。子女的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户口性质和居住地都对父亲的育儿投入具有显著影响。除此之外,父亲的育儿投入还受到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人口结构和居住格局的影响。

数据显示,当子女性别为男,以及为独生子女的时候,父亲的育儿水平会显著提高。流动子女和居住在城市子女能够得到父亲更多的照料;但在情感沟通方面,父亲的育儿投入反而较低。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越高,父亲的育儿投入也越多;此外,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父亲参与事务性育儿活动的可能性越低,但与子女的情感交流程度以及与子女的关系亲密度都会明显提高。此外,当家中有同住老人的时候,父亲参与事务性育儿活动的可能性会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祖辈对父亲育儿功能的替代作用,但这种替代仅限于日常照料活动,而父亲与子女的情感交流则不受老人的影响。最后,父亲的育儿水平还深受家庭居住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因为父亲外出务工经商而导致的两地分居会大大降低父亲育儿投入的水平,由此引发的父亲育儿功能的弱化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本文还发现,父亲的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显著影响。并且,父亲的影响与母亲的影响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对比不同维度的父亲育儿投入,父亲在情感方面的育儿投入比单纯事务性的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更加重要。由此可见,父亲参与育儿不仅意味着要承担起日常照料方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与子女的情感交流与沟通,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育儿效果。不论儿子还是女儿,父亲育儿投入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在学业表现、行为表现和交友数量方面,父亲育儿投入对儿子的影响更强。

综上,当代中国的父亲育儿投入既有与西方国家相似的一面,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祖辈照顾孙辈的文化传统使得家中的老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父亲照料的功能;另一方面,因人口迁移流动导致的两地分居已经对父亲育儿功能的发挥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日后关于中国家庭父亲育儿投入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中国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独特性,从而做出更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除此之外,本文不同于以往同类研究的另一个地方在于,将父亲育儿投入操作化为不同的维度。父亲参与日常照料等事务性的育儿活动与在情感方面与子女的交流沟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育儿投入,不仅影响这两种育儿投入的因素各不相同,而

且它们对青少年发展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建议日后的研究在这一方面继续拓展,从而丰富我们对父亲育儿投入这一概念的理解。

由于笔者研究能力和所使用数据的限制,本文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局限性。CEPS并非专门为研究父亲育儿投入而设计,这使得本文对很多变量的测量是有缺陷的。并且,数据的限制也使得我们对于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的测量也是有缺陷的。例如,无法测量父亲的性别角色观念,也缺乏合适的反映社会文化环境的测量指标。此外,CEPS只询问了是否与父母同住,并未进一步区分不同住是因为父母外出务工还是因为离婚和丧偶等其他原因所致。另外,CEPS的调查对象仅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如果数据能够覆盖更广泛年龄段的儿童,那这项研究将更有价值。总而言之,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对中国背景下父亲育儿投入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对少儿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诸多数据限制,我们的探索依然是比较粗浅的,研究结论是否成立还需后续更多的研究去检验。

参考文献:

- 蒋一茗, 2014,《〈爸爸去哪儿〉火热引发育儿思考》,《乡村科技》第1期。
- 徐安琪、张亮, 2008,《父职参与对孩子的效用:一个生态系统论的视角》,《青年研究》第9期。
- 2009,《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中国青年研究》第4期。
- 张亮、徐安琪, 2009,《父职参与水平:夫妻配对资料的共识和歧见》,《社会科学》第1期。
- Amato, P. R. 1994, "Father-child Relations, Mother-child Relations, and Offspr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6 (4).
- Barnett, R. C., N. L. Marshall & J. H. Pleck 1992, "Adult-son Parent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Son'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3 (4).
- Beller, E. 2009, "Bringing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hy Mothers Matt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 (4).
- Blake, J. 1981, "Family Size and the Quality of Children." *Demography* 18 (4).
- Cabrera, N. J., S. Tamis-LeMonda, R. H. Bradley, S. Hofferth & M. E. Lamb 2000, "Fatherhoo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ld Development* 71 (1).
- Craig, L. & K. Mullan 2011, "How Mothers and Fathers Share Childcare: A Cross-national Time-use Comparis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 (6).
- Doherty, W. J., E. F. Kouneski & M. F. Erickson 1998, "Responsible Fathering: An Overview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0 (2).
- East, L., M. Hutchinson, T. Power & D. Jackson 2018, "Being a Father: Constructions of Fatherhood by Men with

Absent Fathers. ”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4.

Flouri, E. & A. Buchanan 2002, “Life Satisfaction in Teenage Boy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ther Involvement and Bullying. ” *Aggressive Behavior* 28 (2).

—— 2003, “The Role of Father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Later Mental Health. ”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6 (1).

Hwang, C. P. & M. E. Lamb 1997, “Father Involvement in Swede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Its Stability and Correlate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1 (3).

Lamb, M. E. 1997,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New York: Wiley.

—— 2000,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Father Involvement. ”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29 (2-3).

Lamb, M. E. , J. H. Pleck, E. L. Charnov & J. A. Levine 1985, “Paternal Behavior in Humans. ” *American Zoologist* 25 (3).

—— 1987, “A Biosocial Perspective on Paternal Behavior and Involvement. ” In Lancaster, J. B. , J. Altmann, A. S. Rossi & L. R. Sherrod (Eds.), *Parenting across the Lifespan: Biosocial Dimensions*. Hawthorne, NY: Aldine, 111-142.

Lewis, C. 1986, *Becoming a Father*.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McLanahan, S. , L. Tach & D. Schneider 2013, “The Causal Effects of Father Absence.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9.

Milkie, M. A. , M. J. Mattingly, K. Nomaguchi, S. M. Bianchi & J. P. Robinson 2004, “The Time Squeeze: Parental Statuses and Feelings about Time with Children.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3).

Pattnaik, J. 2013, *Father Involvement in Young Children’s Lives*. New York, NY: Springer.

Pleck, J. H. 1997, “Paternal Involvement: Levels,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 In M. E. Lamb (Ed.),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Third edition). New York: Wiley, 66-103.

Raley, S. , S. M. Bianchi & W. Wang 2012, “When do Fathers Care? Mothers’ Economic Contribution and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 Care.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5).

Walsh, F. 2016, *Strengthening Family resilience* (3rd ed.).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罗 婧

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agglomerations-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in eastern China. It studies the differences, the impacts and the optimal solu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in three metropolitan agglomerations by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d GMM estimation, etc.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urbanization level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of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But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2000, so the difference of urbanization level is gradually narrowing. Second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getting rationalized faster in 2000 – 2010, and all three preas show different degrees of “U” typ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nly after 2010,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ll three areas tends to increase continuously. Thirdly, in general,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ree agglomerations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varying degrees. Relatively speaking, i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MONOGRAPHIC STUDY

Educa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

Editor’s Notes Wu Yuxiao 49

Emotional Input or Economic Suppor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Lu Chuntian, Li Yifei & Chen Ling 50

Abstract: At present, students’ performance is the common concern of parents, schools and teachers, and cognitiv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support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ren’s performanc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impacts of family emotional input and economic support on children’s cognitive ability. By analyzing the data of China’s Education Panel Survey from 2013 to 2014 and using mean interpolation, multiple imputation and random forest imputation to deal with the missing values of cor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 find that family emotional involvement dimension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children’s cognitive performance. Different from the public’s expectat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rious economic inputs that parents spend o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have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method of sheaf coefficients, this paper compares two dimensions’ influences on children’s cognitive abil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arents’ emotional input is more effective than other kinds of material input in contributing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ognitive ability.

Father Involvement and Its Impacts on Youth Development in China
..... Xu Qi & Wang Jinshui 68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data of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in 2014 – 2015,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evel and determinants of father involvement, and its impacts on youth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father involvement is widely exist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ut the level of father involvement is still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mother involvement. Secondly,

father involvement is influenced by children's gender, age, sibship size, hukou status, and the place of residence. In addition, the father's socio-economic status, grandparent's involvement and the living arrangement of the family also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father involvement. Thirdly, father involvement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equal to mother involvement. Compared with the involvement in daily care,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father and children is more important for children's development. Father involvement is influential on both sons' and daughters' development.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eritocratic Belief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Li Zhonglu 86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recent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eritocratic belief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s beliefs in meritocracy, and the association is strong after controlling a set of confounding variables. Specifically, we find the frequency of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children's affection to their parents, and consistency of fathers' and mothers' meritocratic beliefs are important mechanism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eritocratic beliefs. Furthermore it indicates that when the noise gets larger in the community, the effect of parents' meritocratic beliefs on children's becomes smaller.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al stat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chool Bullying and the General Trus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 Hong Yanbi & Gu Yishi 106

Abstract: Using a survey data of primary and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Nanj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school bullying on students' general trust. Firstly, the results of OLS regression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f familial socio-economic factors on students' general trust. However, being bullied and the frequency of seeing bad behaviors in schools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s on students' general trust. Secondl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 that it is more possible to be bullied for male students, in lower grades, with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from poor families, from common public schools and seeing a high frequency of school bad behaviors. It requires relevant social actors to provide more effective social support to decrease school bullying and improve the general trust level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APER

How Governance “Campaign-Styled”? ——Multiple Logics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and Behaviors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Liu Mengyue 121

Abstract: It is common to consider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as a strategy which shows a linear logic